

我，十三岁， 妓女，吸毒者

.....



〔西德〕凯·赫尔曼 霍斯特·里克 整理

我，十三岁， 妓女，吸毒者

.....



.....

UNDI

我，
十三岁，
妓女，
吸毒者……

〔西德〕凯·赫尔曼 霍斯特·里克 整理

戴明沛 金瑞明、余乔乔 译

作家出版社

Christiane F.
Wir Kinder Vom Bahnhof Zoo

本书根据 Mercure De France, Paris, 1981 年法文版译出

我，十三岁，妓女，吸毒者……

作者：〔西德〕凯·赫曼·霍斯特·里克 整理

译者：戴明沛 金瑞明 余乔乔

责任编辑：关正文

责任校对：彭卓民 罗静文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98千

印张：10.25 插页：2

版次：1988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123-7/I·122

定价：2.45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介绍

凯·赫尔曼——一九三八年生。原是西德《时代报》、《明镜周刊》、《明星》杂志及《青少年之友》杂志记者、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曾发表过几部著作，主要作品为：《大学生造反记》、《摩加迪沙决定性的干预》等。本人曾获泰奥多尔—沃尔夫文学奖金以及卡尔·冯—奥谢斯基奖章。

霍斯特·里克——一九四一年生。西柏林自由撰稿记者。曾与《明星》杂志及《时代报》有过密切合作并发表过许多有关青年问题的文章。

原书内容提要

这本书在德国刚一出版就成为一本畅销书。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个个都争相传阅。

这本书本来可以不存在。因为起初只是两位记者——凯·赫尔曼和霍斯特·里克为了研究德国青年问题而打算广泛进行采访。一般地讲，这类采访往往是感人而有趣的。然而，当他们去采访克利斯蒂娜的时候，谈话刚进行了几分钟，两位记者就被这位姑娘那流畅、生动的叙述所震惊了。他们当机立断、毅然放弃原先的计划，整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专心致志倾听克利斯蒂娜和她母亲，以及他们周围有关人的叙述。

这位年轻姑娘感人肺腑、坦诚细腻的诉说生动描述了她如何抽第一支“白面烟”开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开始在放学后被迫外出卖淫，以图赚钱支付她那每天所需的两针海洛因，这当中还穿插着姑娘妈妈悲痛的忏悔，从而使得本书成了一本独树一帜的写实小说。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许多有关吸毒、绝望及至今天世界之腐败的活生生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

正如霍斯特——埃贝哈德·里希特教授在他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这本令人肠断心碎的书为我们所描述的部

分青年的不幸和苦恼，远远胜过几十篇由社会学家写出来的分析报告。”

〔调查附记〕

我们初次和克利斯蒂娜见面的时候是在一九七八年初，在柏林法庭上的一次审判会上。当时她只有十五岁，被法院传讯出庭作证。我们邀请她接受我们的采访，以便对德国的青年问题进行一系列的调查。谈话的时间预定为两个小时。可是后来，我们的采访却持续了两个月，而我们这两位调查者竟成了她入迷的听众。她的经历和口才的确令人感动不已！本书就是据克利斯蒂娜本人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她的经历使我们了解到当前德国一大部分青年的精神状况。依我们看来，她的经历胜过一份内容十分充分的调查报告。克利斯蒂娜非常希望这本书能够出版问世，因为如同所有的吸毒者一样，她希望她的呐喊，能够打破当前对于青少年吸毒问题所表现出的这种棘手的沉默。克利斯蒂娜原先所在的团伙里的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家长支持我们这个计划，并且同意我们公开发表他们的名字和照片，以突出本书文献的特点。但考虑到了为了避免对他们的家庭产生某些不良的影响，我们在本书中只写他们的名字，而省略他们的姓氏。除了克利斯蒂娜本人的自述之外，我们还附上她的母亲及其他有关人士的谈话记录和文章，以便从另外的角度来补充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分析。

目 录

作者介绍	3
原书内容提要	4
调查附记	6
序 言	1
柏林大法庭的起诉书	11
新蒙斯特法庭的判决书	13
克里斯蒂娜自述	14
母亲的诉说	49
克里斯蒂娜自述	56
于尔根·克万特牧师	79
克里斯蒂娜自述	83
母亲的诉说	157
克里斯蒂娜自述	164
母亲的诉说	213
克里斯蒂娜自述	223
一份心理学家的分析报告	235
克里斯蒂娜自述	245

母亲的诉说	287
克里斯蒂娜自述	294
译后记	315

序 言

——霍斯特—埃贝哈德·里希特教授

本书给我们讲述了为我们的社会所竭力掩盖、抑制的某种苦恼。依我看来，书中所披露的内容远比一大堆由社会学家所作的分析，或由专家们所写的长篇理论更为重要。这份独一无二的资料终将会使广大的群众——至少这是我们所抱的希望——了解到：今天日益严重的青少年吸毒和酗酒问题，以及年轻人热衷秘密结伙的现象，全都不是什么“舶来品”，而是我们的社会本身所酿成的悲剧。这些到现在还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外来的疾病，竟然产生于我们的家庭、学校及唱片俱乐部里，而这些地方却正是任何人都可以接近的。年轻的克里斯蒂娜（在凯·赫尔曼和霍斯特·里克的帮助下）在她所提供的这份资料中还告诉了我们许多别的事情：在通往吸毒的道路上，并非仅仅拥挤着一班素有怪癖而完全超脱社会的青少年，而是和整个社会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合人情的住宅条件、远不充分的娱乐场所、父母之间关系的破裂、学生与学校和家庭格格不入以及普遍的孤独情绪等等都是促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因素。当读者看完她的叙述而合上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会提出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纵然不幸的克里斯蒂娜是个吸毒者，是一名少年犯，但

是，如果把她同她周围那些构成这个所谓“正常的”社会的人们相比，究竟谁是更富有“人性”、更为“体面”的人呢？

自从年轻人造反的风波日渐平息以来，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就以为一切都已纳入正常轨道，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们认为，除了一小撮恐怖分子和他们的匹敌者之外，今天的青年人都已和整个社会融为一体而毫无冲突。产生这种思想的根源是因为我们常常对某些社会现实加以掩盖和压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青年人对社会强烈不满的情绪以及他们那些几乎是天天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挑衅行为到了七十年代已经消声匿迹。因此，人们往往小看、甚至是忽视了这种抵制的新形式——因为这种形式不象往日那种大喊大叫，那样耸人耳目。须知当今年轻一代的相当大一部分人所采取的正是这种新的反抗形式。

诚然，当我们受到家庭里、中学里和大学里那种整体上的冲突业已平息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大街小巷已经从那些没完没了的游行示威中挣脱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当然也不愿意看到，就在这个升平世界的外表下面，在为数日益增长的年轻人身上，开始出现另一些令人担忧的征兆：一种奇怪的麻木不仁的状态，一种自我反省的倾向。大多数已经立足于社会的成年人都采取一种基本上是防守的，逆来顺受的态度：“搞你们的‘反文化’去吧，过你们的稀奇古怪的生活方式去吧，只要你们不干扰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就行了。可到头来你们终将明白，要想在我们这个有高度组织而且是无情的社会生活中生活下去，那你就不得不下山还俗，重新做个平民！”对青少年漠不关心，甚至对他们表现出

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们可以用这两句话来形容他们的用意：

“让我们安静！”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其实，这种见解只不过是成年人主观的愿望，也是一种盲目的愿望。因为事实上克里斯蒂娜和其他千千万万的青少年都是由于感到失望而脱离了我们的世界，因为大人并不懂得给这些孩子们展现出一个人类大家庭的形象，本来这个大家庭也有他们的一份，而且他们也将乐意参加，并且会在这个大家庭得到理解，感到安全和温暖。克里斯蒂娜和她那帮吸毒者、卖淫的伙伴一样，都有满腹苦衷的父母，他们的父母往往无意之中把自己的失望和孤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以及他们自身的痛苦和怨恨转嫁给他们的孩子。

往往正是向克里斯蒂娜这样的孩子特别敏感，他们的感情十分脆弱，可同时却又充满着自尊。他们从父母一代的失败中得到教训，因而想逃避这个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所谓“正常的”社会。看到这些脆弱的未成熟的孩子为了适应一个不现实的、但却能满足他们内心深处的欲望而结成团伙时，实在可悲之至。而他们的这些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克里斯蒂娜究竟想从她的团伙中寻求些什么呢？无非是要求得到一点点真正的友爱和远离喧闹尘世的安宁。她寻求自己能为他人所接受，以逃脱种种有形无形的压迫。“我不敢肯定，到底在那些不吸毒的青年人当中能否存在象我们团伙中的这种友谊？”对她来说，团伙还是一个逃学避难所。本来，从理论上讲，学校应该是他们所向往的地方，可她却用一种失望的口气讥讽学校：“什么叫‘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不就是首先教导人们懂得和别人一起生活。这才是这所讨厌的学校应该教

我们的课题。应该教我们懂得彼此相互关心。而不应该让每个人说大话，总想出人头地，为了捞个好分数而整天挖空心思不择手段。

也许有的读者为了自我宽慰而认为本书所披露的现象只不过与几个大城市有关而已，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社会边缘的视象罢了。对这种读者，我们可以直言相告：“少年吸毒、少年酗酒，以及由此产生的副作用——少女卖淫和与吸毒直接相连的少年犯罪等早已成为一种遍地蔓延的疾病。可是，为什么人们对这些祸害没有足够的认识呢？克利斯蒂娜的忏悔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解释：在那些了解内情的部门当中——其中有一部分是官方机构（诸如警察局、社会保健机构、医疗所）——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刨根问底，拉起警报。这些总是悄悄地过去，仿佛其中存在着某种默契似的，不管什么部门，都只能按例行公事的老一套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总是满足于观察、登记，最多也只能是把他们关押起来了事。因此，对于这些失足青年的痛苦、绝望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人们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而且竭力把吸毒这个问题说成只是走私、贩卖毒品者的罪行，因而所进行的斗争只不过是一种消毒的问题。有关部门如果能及时在政治上得到更多的支持，那么他们完全可以在治疗和预防方面做出更多的工作。可惜这种政治上的支持迄今仍然有虚无实。而政治行动本身也受到普遍主张克制的公众舆论的压力。这种倾向是由某些政治势力精心策划出来的，因为他们担心任何微小的形影都可能会给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带来损失，所以把一切都归咎于不适应的人或者是外国腐化者的失败。

这里不仅是一个改进有关吸毒者的信息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改变成年人对吸毒问题的态度：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勇气来正视这个不幸的社会问题，因为我们本身对此负有主要责任，无法开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吸毒问题只不过是反映我们这些成年人——我这里只当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无能的一种，明显的症状，说明我们没有办法去说服年轻人的一代相信这一点：在我们给他们所提供的这个社会里，他们完全有机会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寻找到真正人间的温暖。事实上许多青少年之所以投身到吸毒或秘密结社的行列，这完全不是他们生来一蹴而就的天性，而是那些做父母的拒绝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当然这并非是做父母者本来的心愿，而是不知不觉地在同别人相处中形成的足够的条件，导致他们只好走上歧途，另找出路。听听孩子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切身问题，几乎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而恰恰相反，许多做父母的都常常把他们自己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负担转嫁给孩子们，把他们当成了替罪羊或者让他们卷入冲突之中，更有甚者——这种情况也并不罕见——让孩子们替他们解决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克丽斯蒂娜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这种心理机制：人们完全可以准确地分析出这个孩子面对着自己的父母之间的怨恨和他们那远未得到满足的欲望所采取的态度，可是对她来说，由于任务过重，力不从心，因而注定要失败，只不过其失败的方式不同于她的父母罢了。

无论如何，如果把孩子们走上脱离社会的道路看成是他们产生那种无可救药的孤独感的起点，那将是大错特错，因为这种孤独感早已存在。因此我们不能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孩

子们一意孤行而拒绝同别人的交往。而事情恰恰相反，他们这种孤独感的产生正是由于他们同那些负有给他们带来关心和支持使命的人缺乏可靠而牢固的联系。

不过，倘若就事论事，把这个问题简单说成是某个当爸爸或某个当妈妈的过错，那未免又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因为实际上还有许多其它因素导致家长给孩子们带来有害的影响。克里斯蒂娜在这本书中用一种罕见的尖锐口吻，一针见血地指出某种城市规划的弊病，正是这些弊病阻碍了人们之间的正常交往。我们许多所谓“清洁地带”的现代建筑群实际上把人们关闭在一个完全是人为的、冷漠的、机械的环境之中，这样的环境只能大大加剧人们之间的冲突——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当他们搬到这里来安家时，在他们的行李里本来就已经藏着许多矛盾。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格罗比小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这种大建筑群比比皆是，可是在设计的时候往往只从管理和技术上考虑，而忽略了人们情感方面的需要，结果造成一个小区实际上就是一片文化大杂烩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成了少年酗酒和吸毒的“热点”。虽然事出有因，并非偶然。此外，学校也和一些大工场一样，那里也往往充满一种相互陌生、精神孤独的气氛，同样也充满着激烈和残酷的竞争。在这种条件下，当充满生机活力的孩子无法随波逐流、屈服于这种千篇一律的严酷现实时，他们就会在暗地里逃避到另外一个平行的世界中去——一个被他们的幻想所美化了的世界，而只是从表面上去应付家庭或学校里的规矩。这种现象往往难以为人们所觉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克里斯蒂娜瞒着她周围的人，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过着

一种两重性的生活，用其“合群”的假象来欺骗那些可以给她伸出援助的手的人。这些人本来可以给她以勇气，让她悬崖勒马，以免自身堕入那无边的苦海。

这就是这份令人心碎的资料为我们所提供的第一个教训：一个人的堕落往往是要经历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做为家长和学校教师，完全通过许多征兆可以察觉出来，从而及时采取措施，为身遭祸害的孩子提供必要的帮助。无论如何，如果你觉得一个孩子开始显得“心不在焉”，并且似乎只是从表面上本能地参加家庭生活的时候，那你就必须刨根问底，睁大眼睛。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在家里的人眼里已慢慢变成一个局外人，甚至对那些他往日所信任的人也慢慢疏远起来的话，那你就应该想方设法去了解到底这个孩子出了什么事情。然后该怎么办呢？当然，一切都取决于家长、教师的愿望：从孩子的自我反省中认识到一个危险的信号，或者更应该从中看到让孩子从他那些不良的恶习中解脱出来的好处。

第二个教训：应该拥有进行早期治疗的条件，而这种治疗越早越好，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如果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取得家长的合作，甚至有可能的话取得老师的合作，在专家的指导下，开展“家庭治疗”，这方法只要进行及时，效果必然很佳，成功的希望也很大。当然，如果一个年轻人毒瘾已经成性，那就更应该给予治疗，只不过到这种时候再来治疗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些对增加治疗手段以及增设新的治疗中心漠不关心或不屑给予支持的人，着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满足于把吸毒者监禁起来——这是一种为某些政治倾向